

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大学生受骗心理特征识别与思政干预

陈 斌, 陈静全*

浙江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1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1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28日

摘 要

电信网络诈骗持续高发, 大学生因网络参与度高、社会经验不足, 成为突出的易受骗群体。传统高校反诈教育多采用“大水漫灌”的全员宣传模式, 普遍存在“知而不防”的现实困境。为破解传统反诈思政教育实效不足问题, 剖析了传统反诈教育的现实表现与深层成因, 探索基于受骗心理特征识别的大学生反诈“精准滴灌”思政干预路径, 构建心理识别体系与分层分类干预框架。构建起多维的受骗心理识别路径, 形成“纵向分级、横向分类”的精准干预策略。将心理特征识别贯穿预防、干预、恢复全流程, 实现大学生反诈教育从同质化广泛宣传转向精准化思政干预, 提升大学生风险判断与自我保护能力。

关键词

电信网络诈骗, 受骗心理特征, 精准滴灌, 思政干预

From “Extensive Flood-Irrigation” to “Precise Drip-Irrigation”: Identifi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Fraud Victimization and Ideological-Political Intervention

Bin Chen, Jingquan Chen*

College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Zhejiang

Received: September 17, 2026; accepted: October 19,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8, 2026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陈斌, 陈静全(2026). 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 大学生受骗心理特征识别与思政干预. *心理学进展*, 16(10), 482-490. DOI: 10.12677/ap.2026.1610514

Abstract

Telecom and online fraud remains persistently prevalent. With high-level online engagement and insufficient social experience, college students have become prime targets for fraudsters. Traditional anti-fraud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mostly adopts the “extensive flood-irrigation” model of universal publicity, which commonly faces the practical dilemma of “knowing about fraud yet failing to guard against it”. To address the inadequate effectiveness of conventional ideological-political-oriented anti-fraud edu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actical manifestations and underlying causes of traditional anti-fraud education, explores the “precise drip-irrigation” ideological-political intervention approach for college students’ anti-fraud work based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fraud victimization, and establishes a psychological identification system as well as a hierarchical and categorized intervention framework. A multi-dimensional identification pathway for fraud-victim psychology is developed, giving rise to the precise intervention strategy of “vertical grading and horizontal categorization”. By integrating the identification of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prevention, intervention and recovery, college anti-fraud education can shift from homogeneous extensive publicity to targeted ideological-political intervention, so as to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risk-judgment and self-protection capabilities.

Keywords

Telecom and Online Frau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Fraud Victimization, Precise Drip-Irrigation, Ideological-Political Interven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发案最多、上升最快、涉及面最广、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犯罪类型之一。国家层面高度重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为,2025年全国公安机关仍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会同相关部门拦截诈骗电话36亿次、短信33亿条,紧急止付涉诈资金2170.7亿元,各地公安机关累计见面劝阻674.7万人次。反诈治理之艰巨可见一斑,然而打防并举之下,一个突出矛盾依然存在:作为网络使用最活跃而社会经验相对不足的群体,大学生正日益成为诈骗分子套路的重点对象。中国青年网调查显示,75.6%的受访大学生曾接到过诈骗电话或诈骗信息;麦可思研究对2478名高校大学生的调查亦发现,受骗信息类型集中于刷单返利、冒充熟人借钱、校园贷与投资理财等;而在受骗的在校大学生中,仍有19.0%遭受5000元以上的重度经济损失。

面对上述问题,高校普遍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反诈宣传体系,主题班会、专题讲座、案例通报、校园宣传、知识竞赛以及国家反诈中心APP推广等方式不断丰富。然而,实践中“知而不防”“防而不止”的现象仍然存在,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看,反诈教育本身并非附加于思政工作的安全知识宣传,而是与大学生价值判断、风险意识和社会信任等密切相关的育人过程。传统“大水漫灌”强调广覆盖、强宣传、重提醒,能够解决“有没有教育”的问题,却难以解决“教育是否精准”“心理是否被触达”“行为是否发生改变”。因此,有必要把大学生受骗行为放回其心理机制和成长情境中考察,在识别不同学生受骗易感特征的基础上进行分层、分类干预,推动反诈教育由“讲骗局”转向“练判断”、由“全员同质供给”转向“风险差异匹配”、由“事前宣传”转向“预防-干预-恢复”全周期育人。

2. “大水漫灌”式传统反诈教育的实效困境与归因

2.1. 传统反诈教育的主要形式与运行逻辑

当前高校反诈教育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工具箱”。主题班会与专题讲座承担集中讲授功能, 校园宣传栏、横幅海报和安全手册承担环境浸润功能, 反诈 APP 和公众号等线上平台承担工具普及功能, 知识竞赛、案例巡展等则承担活动引流和氛围营造功能。这些方式具有成本可控、组织方便、覆盖面广等优势, 对于提高大学生对常见诈骗类型的知晓度具有基础价值(郑珍, 2025)。

然而问题在于, 长期依赖上述模式容易形成一种以“覆盖”为核心的运行逻辑: 只要活动开展了、学生参加了、宣传材料发放了, 就容易被视为反诈教育已经完成。陈红敏等指出, 电信诈骗是诈骗者营造的诈骗情境与受骗者自身特征相互作用的过程, 受骗易感性、诈骗者所使用的社会影响技术以及受骗时的心理状态均会影响误信(陈红敏等, 2023)。因此, 以“广覆盖”为核心的宣传逻辑能够解决“有没有教育”的问题, 却未必能够解决学生在真实情境中“会不会判断”“能不能暂停”和“是否愿意求助”的问题。

从运行方式看, 传统反诈教育主要呈现四个特征。第一, 覆盖导向的“广撒网”。教育主要以扩大覆盖面为目标, 将学生作为整体性对象进行普遍宣传, 重点考核主题班会召开率、宣传覆盖率和 APP 安装率等指标, 而对不同学生的受骗风险及其心理特征关注不足。第二, 内容供给的“一刀切”。在完成普遍覆盖的基础上, 教育内容仍主要采用统一案例、统一警示语和统一知识测试, 对大一新、毕业生、经济压力较大的学生、网络社交活跃学生等不同群体所处的风险情境缺乏针对性设计。第三, 实施方式的单向灌输。教师、民警或宣传材料主要承担信息传递和知识讲授功能, 学生则更多处于被动接受位置, 对真实诈骗情境中的判断、核验、求助和止损等行为训练不足(汤方明, 2025)。第四, 运行过程的“活动化”。反诈教育较多集中于开学季、安全教育月或特定宣传节点, 活动结束后缺乏持续追踪、动态反馈和效果评估, 因而容易形成“集中宣传 - 活动结束 - 教育弱化”的运行模式。

2.2. 传统反诈教育实效不足的现实表现

尽管各高校在反诈教育上投入了大量资源, 但实效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 集中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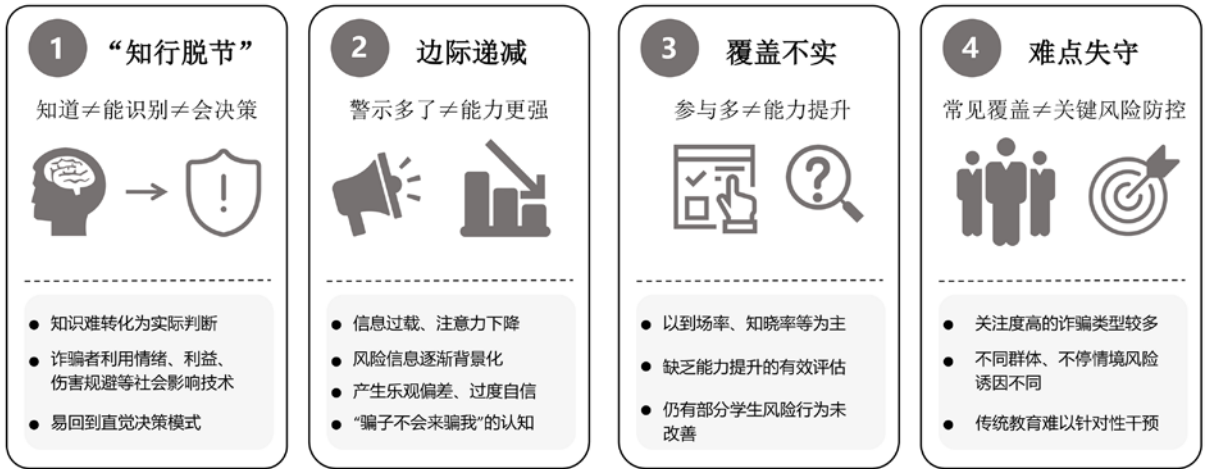


Figure 1. Manifestations of deficiencies in traditional anti-fraud education

图 1. 传统反诈教育不足的表现

其一, “知行脱节”。学生知道诈骗套路, 并不意味着其在真实压力下能够完成风险识别和理性决

策。并降低其主动调动认知资源进行深度加工的倾向；诈骗者还会利用利益诱导、伤害规避、情感救助和情感投资等社会影响技术塑造情境(陈红敏等, 2023)。因而, 反诈教育若主要停留在结论记忆层面, 学生在真实情境中仍可能回到原有的直觉决策模式。

其二, “边际递减”。当警示信息长期以相似形式高频出现, 学生可能出现信息过载、注意力下降和反诈疲劳。反复看到“陌生链接不要点”“刷单就是诈骗”等口号, 并不会自动增强学生在复杂情境中的辨别能力, 反而可能使风险信息逐渐背景化。部分学生还可能产生乐观偏差、过度自信, 产生“骗子不会来骗我”的认知, 把自己置于风险之外(任宇波, 罗永此, 2022)。

其三, “覆盖不实”。传统教育往往更容易统计“参加了多少场活动”, 却较难回答学生是否真正提高了风险感知、证据核验、延迟决策等等能力。若评价仍主要停留在到场率、知晓率和 APP 下载率, 教育就可能陷入“过程完成即效果实现”的误区。调研显示, 95.3%大学生主观认可高校反诈教育的重要性, 但仍存在部分学生风险行为没有得到改善的现象(郑珍, 2025)。

其四, “难点失守”。传统反诈教育虽然能够覆盖常见诈骗类型, 但对不同群体、不同情境下的反诈难点关注不足。刷单返利、“杀猪盘”投资、冒充熟人等类型具有较高关注度, 同时大一新生、毕业班学生、经济压力较大的学生和情感支持不足的学生存在值得关注的风险敞口。不同群体所面临的诱因并不相同, 但传统教育往往使用同一套案例和话术进行普遍宣传, 难以针对具体心理机制进行干预(贺泉莉等, 2026)。

2.3. 实效困境的多维归因

从反诈信息的提供者看, 传统反诈教育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内容同质化、说教化, 教育内容多以统一的案例和警示语为主, 与学生的真实生活场景和具体风险需求存在一定距离; 二是内容更新相对滞后, 随着诈骗技术、话术以及传播渠道不断变化, 反诈教育内容的更新速度难以及时回应新型诈骗风险; 三是教育方法较为单一, 更多侧重于“告诉学生不要做什么”, 而对“面对不确定信息时应该如何判断、核验和应对”的过程性训练相对不足。双加工理论认为, 个体绝大多数判断决策会优先启动直觉系统, 仅在遭遇明确风险提示、主动刻意思考时才会激活分析系统(Frank et al., 2009)。事实上, 诈骗分子往往通过贪利、恐惧、同情、权威、从众等心理线索降低个体的审慎程度, 使其在时间压力和情绪唤醒状态下快速作出判断(陈红敏等, 2023)。当反诈教育只是提供明确结论, 而缺乏对判断过程和应对策略的训练时, 学生进入真实诈骗情境后仍可能依赖原有的直觉决策模式, 难以将所学知识有效转化为实际的风险识别与应对行为。

从反诈信息的接受者看, 大学生并非被动接受信息的“容器”, 而是具有不同需求、经验、情绪状态和社会关系的行动主体, 其受骗风险也因此呈现出明显的个体差异。前景理论认为, 个体的风险决策并非基于绝对收益与损失的理性计算, 而是以自身主观参考点为基准, 对收益和损失产生差异化的感知偏差: 面对收益时倾向于风险规避, 面对损失时倾向于风险偏好, 且对损失的敏感度远高于同等额度的收益, 同时容易受乐观偏差、侥幸心理、情绪状态等主观因素干扰(Tversky & Kahneman, 1974)。部分学生可能因乐观偏差而高估自身识别和应对诈骗的能力; 侥幸心理可能使其在察觉异常后仍抱有“再试一次”的想法; 贪利心理则可能增强高收益承诺的吸引力; 在跨期决策中, 部分个体更偏好即时的小额收益, 而相对忽视长期潜在损失(刘玮玮等, 2024)。与此同时, 从众心理和权威服从可能使“大家都在做”“这是官方流程”等信息降低个体的警惕程度; 孤独、情感依赖和同情心理则可能被诈骗者利用, 以建立关系、增强信任并逐步实施操纵(贺泉莉, 王莹, 2025)。尤其是在冒充公检法、平台客服、老师或熟人等诈骗情境中, 诈骗者所利用的并非单一的知识缺口, 而是个体在特定情境下的心理倾向、情绪状态与社会关系。因此, 仅依靠普遍性的知识宣传, 难以覆盖不同学生的具体心理风险。

从教育效果评价看, 传统反诈工作容易将“开展了多少场宣传活动”“覆盖了多少学生”等过程性指标作为主要评价依据, 而对学生实际形成了怎样的风险识别能力、是否发生行为改变关注不足。由此, 反诈教育往往缺少较为稳定的“前测-干预-后测”闭环, 也缺乏对学生在真实或模拟风险情境中的行为表现进行持续观察。例如, 收到预警后能否主动停止转账, 面对可疑信息能否进行多渠道核验, 遭遇诈骗时能否及时求助, 以及受骗后能否逐步恢复正常学习和社会交往等, 都尚未充分纳入教育效果评价之中。这使反诈教育容易停留在“完成宣传任务”的层面, 而难以真正形成风险识别、行为调整和心理恢复相衔接的干预闭环。

综上, 传统“大水漫灌”式反诈教育的根本症结, 可以概括为“不识别对象、不针对心理、不训练行为、不追踪恢复”。其突出问题并非反诈信息供给不足, 而是信息供给与学生个体差异、心理机制和真实行为之间缺乏有效衔接。由此, 从“大水漫灌”走向“精准滴灌”, 首先需要改变将学生视为统一宣传对象的思路, 将其转化为需要被识别、理解和支持的具体个体, 并进一步将心理特征识别贯穿于风险预防、行为干预和受骗后恢复的全过程。

3. “精准滴灌”式思政干预的内涵特征

“精准滴灌”式思政干预并不是简单地将反诈宣传做得更加细致, 而是对传统反诈教育的对象定位、内容供给和育人方式进行系统调整, 其核心在于改变“所有人接受相同内容”的教育逻辑, 转向“不同风险的学生获得与其心理特征、现实需求和生活情境相匹配的教育与支持”。这一转变不仅体现为教育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 也体现为学生主体地位、心理机制关注和育人过程的全面深化(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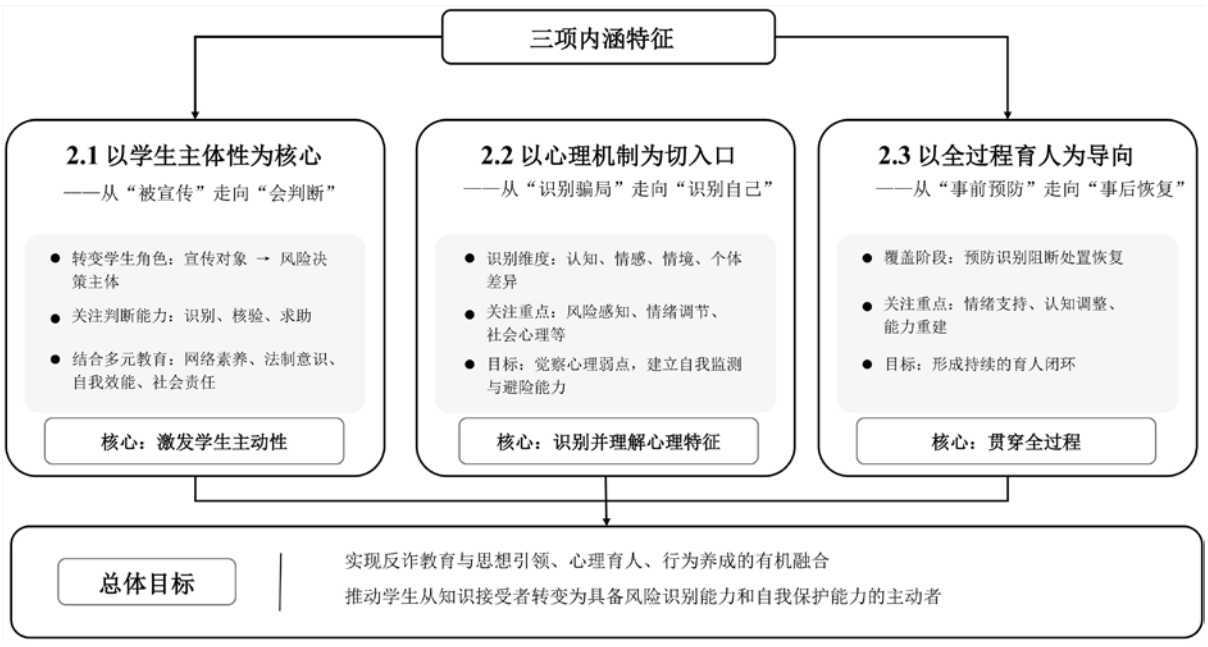


Figure 2.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recise Drip-irrigation”-style ideological-political intervention
图 2. “精准滴灌”式思政干预的内涵特征

3.1. 以学生主体性为核心：从“被宣传”走向“会判断”

精准反诈首先意味着学生角色的转变, 即从被动接受反诈知识的宣传对象转变为能够主动识别风险、独立作出判断并采取保护行为的决策主体。传统反诈教育多以集中宣讲、案例展示和知识普及为主, 能

够实现较大范围的信息覆盖,但“知道骗局”并不等于“能够识别骗局”。在真实诈骗情境中,诈骗者往往通过利益诱导、身份伪装、情感操控和制造紧迫感等方式,使学生处于较高情绪唤醒和时间压力之下,单纯依赖记忆中的反诈知识并不一定能够阻断错误决策。因此,精准反诈应将教育重点由“告诉学生什么是诈骗”转向“帮助学生形成判断和应对能力”。相关研究指出,可以通过认知训练、情境模拟、角色扮演等方式,提高学生对诈骗信息的识别能力和风险敏感度,促进防骗知识向实际行为转化。

在此基础上,高校应围绕真实生活场景训练学生形成可迁移的风险判断规则。例如,面对陌生信息先暂停,面对利益承诺先核验,面对权威要求先验证身份,面对紧急指令先争取时间,面对无法判断的情况主动求助。反诈教育还应与网络素养、法治意识、自我效能和社会责任教育相结合,引导学生理解个人判断与网络安全之间的关系。由此,学生获得的不再只是若干固定的反诈答案,而是一套能够迁移到不同网络情境中的风险决策能力,实现由“被宣传”向“会判断”、由外部要求向自我保护的转变。

3.2. 以心理机制为切入口:从“识别骗局”走向“识别自己”

精准干预是把诈骗线索识别与自我心理识别结合起来。国内已有多套成熟的受骗易感性测评工具,从不同维度解构受骗心理:谭秀娟等(2025)编制量表划分电信网络风险偏好、信息处理与警惕性、互动顺从性、互动自控性四大维度;孙晨博等(2024)将受骗易感性分为网络使用习惯、网络信任倾向、信息加工方式、反诈知识储备、需求偏好、自我控制六个因子;任宇波和罗永此(2022)的问卷划分为风险动机、直觉偏好、过度自信、鉴别困难,还可以实现红-橙-黄三色风险等级划分。

依托上述测评工具,可以从多维度解析学生受骗心理:在认知层面关注风险感知、信息判断、贪利与侥幸心理;在情感与社会心理层面关注孤独感、情感依赖、同情、从众以及对权威的盲目信任;在情境层面聚焦恐惧情绪、时间压迫、高情绪唤醒引发的决策失控;同时兼顾年级、经济压力、社会支持、自我效能等个体差异变量,引导学生觉察自身心理弱点,认清“何种情境下个人判断容易发生偏差”,最终建立起自我监测、主动避险的内在保护能力。

3.3. 以全过程育人为导向:从“事前预防”延伸至“事后恢复”

精准反诈不能仅以“没有被骗”作为教育成效标准,学生受骗后的心理支持、认知调整和能力恢复同样属于育人过程。受骗以后,学生可能经历震惊、否认、自责、羞耻、愤怒和焦虑等情绪,并出现害怕被责备、不愿主动求助、怀疑自身判断能力等问题。个案研究发现,受骗经历可能进一步伴随失眠、学习效率下降和社交回避等表现,而持续性的心理支持与能力重建有助于学生逐步恢复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适应力(贺泉莉,王莹,2025)。因此,高校反诈工作不能在完成止损、报案等事件处置后简单结束,而应关注学生受骗后的情绪状态和成长需要,避免将受骗归结为个人“粗心”或“能力不足”。

从全过程育人的角度看,应逐步形成“预防-识别-阻断-处置-恢复-再教育”的连续机制。事前通过风险识别和情境教育提高学生防范意识;事中通过预警、劝阻和求助机制降低损失;事后则通过心理支持、事件复盘和能力重建,帮助学生理解诈骗者如何利用其心理弱点以及自身在哪些决策环节出现偏差。对于存在持续心理困扰、经济压力或社会支持不足的学生,还应结合实际开展心理支持、家庭协同和必要的专业转介(贺泉莉,王莹,2025)。如此,反诈教育才能从单纯的“事前防骗”延伸至“事后恢复”,将一次受骗经历转化为风险素养、自我效能和社会适应能力提升的教育契机。

4. 基于受骗心理特征识别的精准干预机制构建

4.1. 大学生受骗心理特征的类型学分析

结合现有研究,可将大学生受骗心理特征概括为四个相互联系的层面。第一是认知与决策层面,包

括启发式加工、信息甄别不足、风险低估以及对收益的过度关注。第二是需求与动机层面, 包括金钱动机、财务风险偏好以及兼职、贷款、投资和情感关系等需求。第三是社会与情绪层面, 包括信任倾向、易受影响、从众、权威服从、恐惧、焦虑和情感依赖。第四是个体与情境层面, 包括网络使用习惯、既有防诈骗知识、自我控制、社会支持以及受骗时的时间压力等。不同量表虽然维度设置并不完全一致, 但均说明受骗易感性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而非单一“粗心”或“知识不足”(王浩宇等, 2025; 孙晨博等, 2024)。

进一步而言, 心理特征与诈骗线索之间一定的情境耦合。金钱动机、财务风险偏好可能与高收益兼职、刷单返利、投资理财等利益诱导型诈骗相互作用; 高信任和易受影响可能增加冒充熟人、网络交友或情感投资中的风险; 恐惧和权威服从则可能在冒充公检法、平台客服等情境中被激活。需要强调的是, 这种对应关系主要用于理解风险机制, 而不应被解释为确定性的因果判断。陈红敏等强调, 受骗是诈骗情境与个体特征交互作用的过程。

4.2. 受骗心理特征的识别路径与工具

“精准滴灌”式思政干预的前提是建立多维、动态且伦理可控的识别体系。第一, 以心理测评建立基线。高校可在心理健康教育或安全教育中适度引入成熟的诈骗易感性、风险感知、自我效能和社会支持测量。第二, 以行为数据辅助风险研判, 在依法合规、最小必要和明确告知的前提下, 结合反诈预警、校园服务和求助记录识别异常线索。第三, 以辅导员谈心谈话、朋辈网络和日常观察补充数据系统难以理解的情绪、经济压力 and 人际变化。第四, 对既往受骗案例进行结构化复盘, 记录诈骗类型、接触渠道、心理诱因、关键决策节点和求助时间, 为后续干预提供经验反馈(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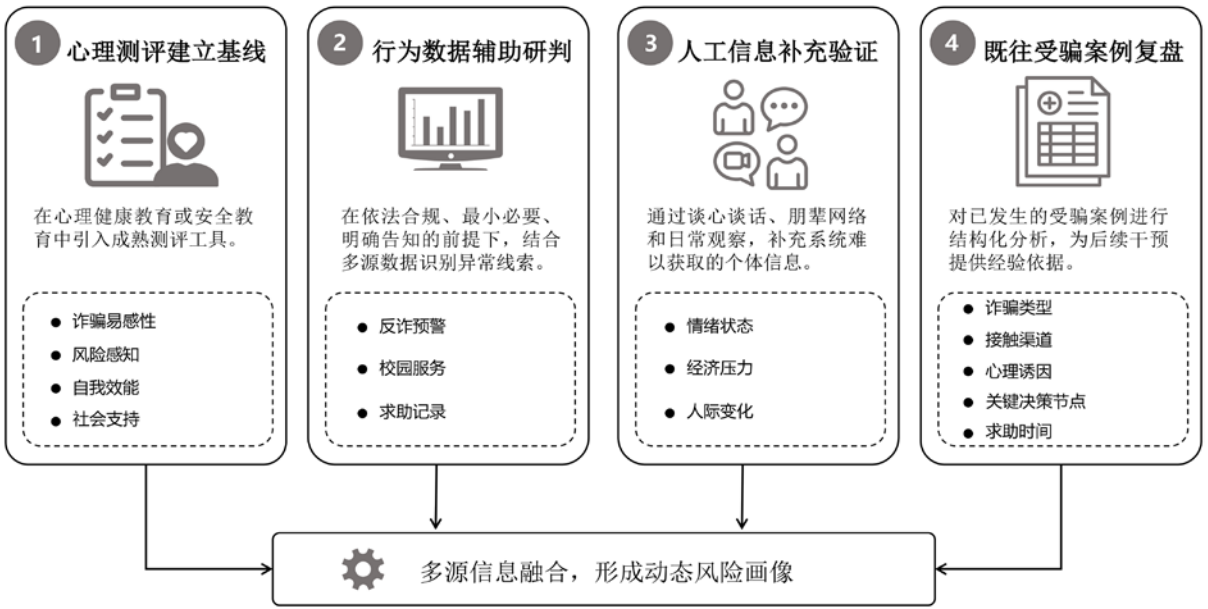


Figure 3. Identification system of “Precise Drip-irrigation”-style ideological-political intervention

图 3. “精准滴灌”式思政的识别体系

在数据伦理方面, 应坚持“服务学生而非监控学生”的基本原则。涉及心理状态、经济状况和个人行为的数据具有较高敏感性, 应明确使用边界、访问权限、保存期限和人工复核机制; AI 生成的风险提示只能作为辅助线索, 不宜直接作出学生是否“高危”的决定。尤其在心理恢复环节, 应避免因算法标签使受骗学生再次遭受污名化。

4.3. 分层分类的精准干预策略体系

结合受骗心理识别结果, 本研究构建“纵向分级、横向分类”的干预路径, 兼顾不同风险等级与心理易感群体的差异化需求(见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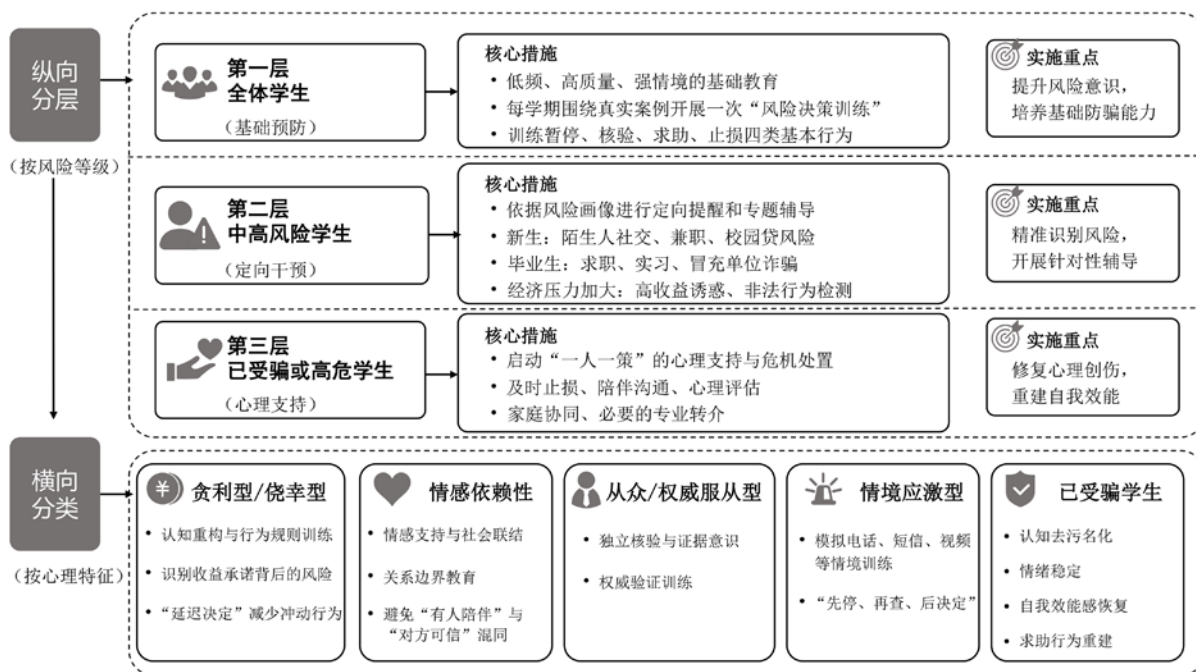


Figure 4. Intervention system of “Precise Drip-irrigation”-style ideological-political intervention

图 4. “精准滴灌”式思政的干预体系

纵向上建立三级干预。第一层面面向全体学生, 重点不是增加宣传数量, 而是提供低频、高质量、强情境的基础教育, 例如每学期围绕真实案例开展一次“风险决策训练”, 训练暂停、核验、求助和止损四类基本行为。第二层面面向中高风险学生, 依据风险画像进行定向提醒和专题辅导, 如对新生加强陌生人社交、兼职和校园贷风险训练, 对毕业生加强求职、实习和冒充单位诈骗训练, 对经济压力较大的学生加强高收益诱惑和非法兼职识别教育。第三层面面向已受骗或处于高危情境的学生, 启动“一人一策”的心理支持与危机处置, 包括及时止损、陪伴沟通、心理评估、家庭协同和必要的专业转介。

横向上则依据心理特征分类施策。对贪利型和侥幸型学生, 应突出认知重构和行为规则训练, 帮助其识别收益承诺背后的风险, 并通过“延迟决定”减少冲动行为; 对情感依赖型学生, 应加强情感支持、社会联结和关系边界教育, 避免把“有人陪伴”与“对方可信”混同; 对从众和权威服从型学生, 应强化独立核验、证据意识和权威验证训练; 对情境应激型学生, 则应通过模拟电话、短信、视频和即时聊天等方式反复训练“先停、再查、后决定”; 对已受骗学生, 应重点进行认知去污名化、情绪稳定、自我效能恢复和求助行为重建。

4.4. 精准干预体系伦理边界和实施可行性

精准识别以多源数据为基础, 若缺乏边界约束, 可能从“服务学生”异化为“监控学生”、“标签化学生”。数据隐私方面, 应坚持目的限定、最小必要和知情同意, 采集前经伦理审查, 存储去标识化、加密和分级授权。结果解读方面, 应将风险标签转化为服务标签, 禁止公开排名和与学业评价挂钩, AI 研判结果仅作辅助, 后续育人步骤必须人工复核。学生干预方面, 对已受骗学生坚持去污名化, 做好保

密协议, 校院联动, 与心理中心、保卫处、法律顾问等协同, 嵌入现有心理健康与安全教育, 按风险等级分层匹配资源, 开展心理评估、危机干预、数据伦理和 AI 素养培训。只有以伦理约束和制度保障为底线, 以人工复核和协同支持为关键, 精准识别才能避免异化为“监控学生”和“标签学生”, 真正服务于“精准滴灌”式思政育人。

5. 总结与展望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迭代, 大学生因其网络活跃度高、社会经验不足, 已成为诈骗分子重点侵害群体。高校传统“大水漫灌”式反诈思政教育依靠主题班会、宣传讲座等形式实现广泛覆盖, 但存在知行脱节、警示边际效应递减、覆盖不实、难点失守等现实困境, 其根本症结在于不识别学生个体对象、忽视受骗心理特征、缺少实操行为训练、忽视受骗后心理追踪恢复, 反诈知识供给与学生真实心理、行为情境出现错位, 造成“知而不防”的教育难题。

而通过转向“精准滴灌”的思政干预, 摒弃全员同质化宣传模式, 匹配不同风险学生的心理特征与现实需求, 能够实现以学生主体性为核心, 推动学生从被动接收宣传转向主动风险判断; 以心理机制为切入点, 引导学生觉察自身心理易感弱点; 以全过程育人为导向, 构建“预防-识别-阻断-处置-恢复-再教育”完整育人链条。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 将 AI 技术合理融入大学生反诈思政工作, 为受骗心理特征的精准识别与分层干预提供了新的技术可能。未来高校反诈“精准滴灌”模式, 可在严守数据伦理、坚持最小必要、知情同意的前提下探索 AI 赋能路径。

基金项目

2025 年度浙江省教育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大学生受骗心理画像分析和精准干预实践”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 Y202558957)。

参考文献

- 陈红敏, 赵雷, 郭素然, 莫雷(2023). 电信诈骗如何导致误信: 影响因素、解释理论及研究展望.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 94-106+207.
- 贺泉莉, 王莹(2025). 网络诈骗受害高职学生的教育干预策略: 基于个体受骗易感性的个案研究. *时代青年*, (31), 123-125.
- 贺泉莉, 王莹, 张清桃(2026). 人格特征对高职学生受骗易感性的影响: 金钱态度的中介作用. *心理月刊*, 21(8), 132-135.
- 刘玮玮, 李悦, 尹锡杨(2024). 大学生受骗易感性、控制感、跨期决策和风险决策的相关研究. *心理月刊*, 19(17), 97-99.
- 任宇波, 罗永此(2022). 电信网络诈骗受骗易感性问卷编制及其信效度检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8(3), 32-37.
- 孙晨博, 赵雪莲, 赵桂芬, 魏麟, 车世琨(2024). 大学生电信网络诈骗受骗易感性问卷的编制.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38(10), 894-900.
- 谭秀娟, 鹿子佳, 聂永飞, 白学军(2025). 大学生电信网络受骗易感性量表的编制. *心理与行为研究*, 23(2), 280-288.
- 汤方明(2025). 心理学视域下提高大学生反诈防骗能力研究. *高校后勤研究*, (1), 68-71.
- 王浩宇, 王丹, 杨宸(2025). 电信网络诈骗受骗易感性量表的编制与信效度评价.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39(11), 981-987.
- 郑珍(2025). AI 时代大学生电信网络诈骗受害的现状、原因及防控路径.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 42(5), 104-112+120.
- Frank, M. J., Cohen, M. X., & Sanfey, A. G. (2009). Multiple Systems in Decision Making: A Neurocomputational Perspective.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8, 73-77. <https://doi.org/10.1111/j.1467-8721.2009.01612.x>
- Tversky, A., & Kahneman, D. (1974).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Science*, 185, 1124-1131.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85.4157.1124>